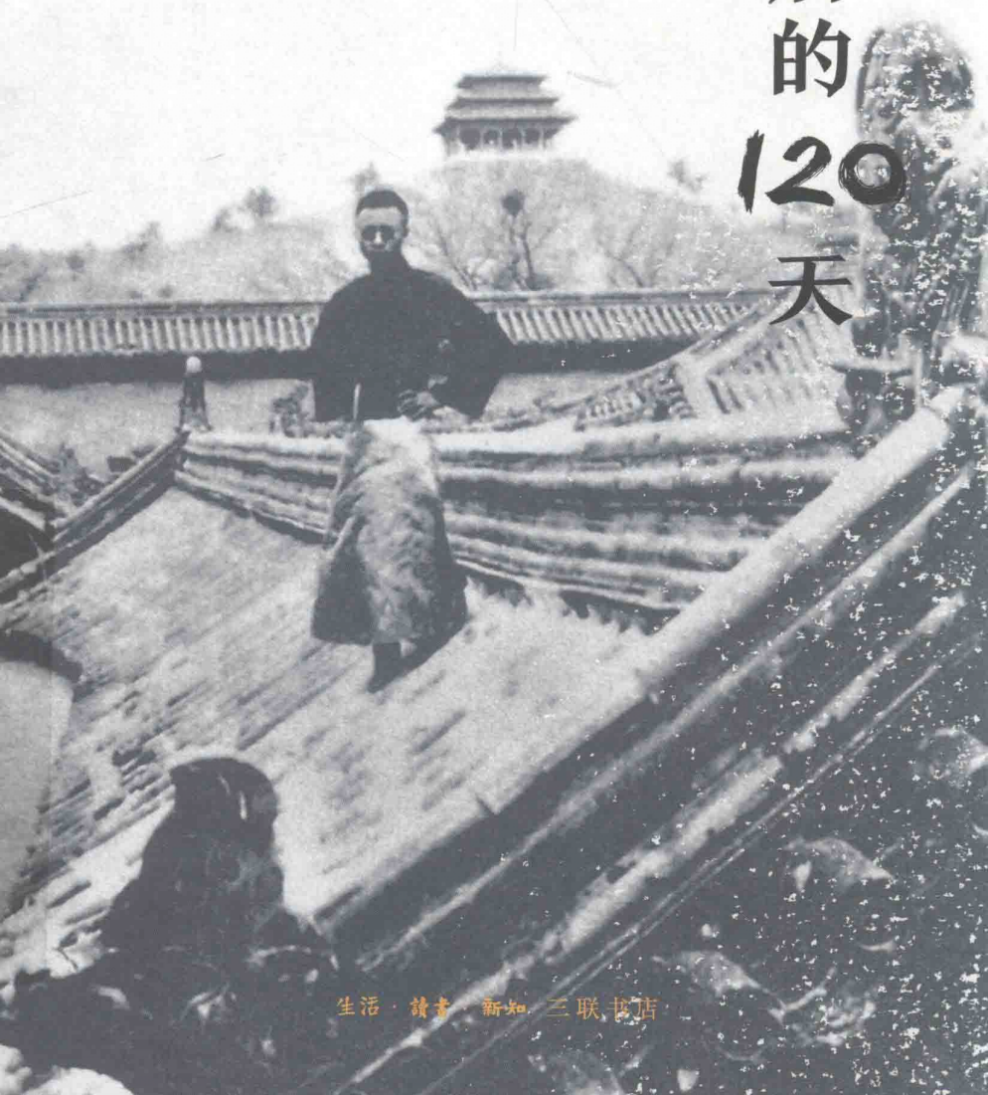


刘江华 著

# 清朝 最后的 120 天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清朝  
最后的  
120  
天

刘江华 著



Copyright © 202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最后的 120 天 / 刘江华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5  
ISBN 978-7-108-06974-0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90900 号

责任编辑 钟 韵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2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6.75

字 数 492 千字 图 48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8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序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中国乃至全球华人世界的热闹场景似乎还在眼前，时间一晃已经近十年。虽说喧嚣之后总会复归平静，却总有几个有心人仍在默默耕耘，然后就有了一份收获。

江华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人。记得当年他说起正在从清朝覆灭入手，阅读这方面的史料，准备探讨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有点吃惊，也颇为期待。多年以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直是“显学”，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均投入了大量资源。逢五逢十的纪念活动及相关学术研讨不说，有关重要人物特别是革命党方面的人物资料编纂和研究、有关史实的历史记录和后人回忆，几乎年年都有发布，令人目不暇接。进入这个领域，需要勇气，更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坚韧。

大约三年前，江华完成了初稿。稿子以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为时间范围，叙述了清廷方面的对策和手段，这种角度是以往著述很少采用的。该书主要不是参与学术圈的讨论，而是面向知识大众，讲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有关活动的最新知识。对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详细比勘各种史料，整合相关研究成果，追溯来源，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行文风格则一如其旧，以重建史实为宗旨，细节丰富，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尽可能具体真实，不故作深奥，不含

糊其词。兹举三例，以见一斑：

其一，清廷任命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后，袁氏曾提过复出的条件，不少论著将其归纳为袁氏和徐世昌共同密谋的“六项条件”，似已成为共识。近年来有学者根据袁氏自己所说的“节略八条”，否定了袁徐共谋之陈说，但仍未找到原始文本，包括2013年出版的《袁世凯全集》也未收入。作者从2011年12月出版发行的八十卷《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所收的朱批奏折中，拣出一份附件，经过与多种相关文件的比对，断定即为“失踪”已久的袁氏节略原本。这一考订言之成理。而从该文内容和所署时间看，流传已久的袁氏“以足疾为由婉拒出山”的说法缺乏史料依据。

其二，武昌起义后，清廷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销，想尽一切筹款办法，如息借洋款，勒令亲贵大臣捐饷，发动官员购买公债，甚至变卖沈阳大内和承德行宫瓷器等，均无成效，只得动用内帑救急。清宫一共拨付了多少内帑？以往的记述或语焉不详，或出入较大。作者根据档案、官书、当事人日记等资料，统计出隆裕太后分八次下拨内帑银共一百六十余万两，分两次下拨黄金十六万两（约合白银六百万两），这些现金，是慈禧太后留下的。由此可见，财政困窘，是清廷不能支撑战局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三，当年南北双方磋商的清室优待条件及其后拟定的清帝退位诏书，由于商讨时间较长、意见不一，所以留存下各种版本。本书抄录了现存所有版本，根据文献归纳主要分歧及其商讨的结果，并就一些争议问题的解决进行细致分析，从而基本复原了这两个重要文本形成的具体过程。这种写法，对于专门研究者可能多此一举，却有利于没有条件一一寻觅原始文件的读者进入当年的语境，体味历史事件如何发展变化，历史人物如何发挥作用，从而获取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悟。

书中此类叙述甚多，读者自可在阅读中发现。

关于清末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我只是四十年前在上海读书

时有过一点涉猎，对于近年来的进展了解不够，本来不应该饶舌。承蒙江华厚爱，让我对他的新作先睹为快，由此生发一些感受与大家分享，若说得不对，敬请谅解和指正。最后，祝贺江华给读者奉献一部佳作，并预祝成功。

潘振平

2020年3月

# 目 录

序 潘振平 1

缘 起 起义爆发 1

一 武昌起义：猝发与必然 3

二 十年立宪之失败 7

三 清朝最后的 120 天 11

第一章 动荡京师 15

一 消息发酵 16

二 逃离京城 36

三 市面恐慌 45

四 谣言整肃 56

第二章 调兵南下 69

一 厉兵与换将 70

二 阳夏鏖兵 93

三	战事之余	105
第三章	官场乱象	119
一	几近混乱的朝廷	121
二	独立省份的督抚们	132
第四章	袁氏出山	161
一	袁世凯出山	162
二	出山八条件还原	189
三	南下迎敌与北上弄权	201
第五章	南北议和	223
一	袁方劝降，黎氏拒抚	224
二	英方调停，汪袁密谋	235
三	上海和谈，唐伍磋商	260
四	隔空谈判，劳而无果	301
第六章	财政困局	313
一	人不敷出，赤字财政	314
二	动用内帑银	330
三	发行“爱国公债”	337
四	息借洋款	349
五	袁世凯盗卖清宫瓷器真相	363
第七章	清帝退位	379
一	御前商议退位	380

二	清室优待条件的南北磋商	396
三	退位诏书的百年疑云	436
第八章	一国二主	457
一	总统职务的流转与让渡	458
二	孙袁共同治国的46天	474
尾 声	妥协民国	489
附 篇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案细节	496
	末代摄政王载沣与最后一位太后隆裕	506
	逊帝溥仪的禁宫生活	532
	从通缉犯到座上宾——孙中山与晚清权贵的交往	548
参考书目		563
后 记		572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sup>[1]</sup>晚八时，位于武昌城内黄土坡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响起清脆的枪声，共进会会员、士兵程正瀛开枪打伤前来巡营的排长陶启胜，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sup>[2]</sup>之后，一群士兵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出营房，走上大街，占据了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当晚，在炮兵的支援下，起义军开始攻打湖广总督署。狼狈之下，湖广总督瑞澂被迫凿开督署后花园临江的围墙，仓皇避往停泊在长江之上的楚豫兵轮。一夜激战过后，起义军于八月二十日清晨占据武昌，当天下午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这一事件，史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大幕由此揭开。

武昌起义带来了清廷巨大的压力。为镇压起义，清廷先是派陆军

---

[1] 本书涉及时间的间隔较密，为行文方便，只在关键处加注公历时间，其余处以旧历时间为主。读者可参看本书所附“120天大事记”的时间线索。

[2] 关于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熊秉坤率先开枪说是长期以来较主流的看法。冯天瑜、张笃勤先生借助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档案，考证认为打第一枪者为士兵程正瀛。参见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7—253页。

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兵马南下，又于八月二十三日被迫重新起用赋闲在家三年的袁世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袁世凯再次出山。这是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又一次粉墨登场。在积极筹备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派旧部刘承恩、蔡廷干等与湖北军政府方面接触，试图招抚，但未获进展。九月十一日、十月初七日，冯国璋率部先后攻占汉口、汉阳。尽管冯国璋宣称“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sup>[1]</sup>但袁世凯还是认为，彻底平定湖北革命党并非最佳策略。再加上种种形势的压迫，如湖北、湖南、陕西等十四省份宣布独立，海军的反正，以及南京、上海的丢失等，于是，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袁世凯决定开始与南方民军议和。

十月二十八日，清廷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与民军总代表伍廷芳、湖北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等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了首次和谈，决定各处一律停战。之后，直至十一月十三日，南北双方共举行了五次和谈，商定清军后撤、速开国会以决定政体，并触及清室优待条件等重大内容。在此期间，十一月初十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眼看总统职位有落空之虞，袁世凯便改由自己直接与伍廷芳谈判。在孙中山多次承诺让出临时大总统一职后，袁世凯开始转面向清廷施压，逼迫清帝退位。几经交涉，清室的优待条件终获南北双方同意。鉴于南方各省相继独立的现实，也鉴于全国军民趋向共和的心理，更鉴于清廷财政濒于绝境的现状，隆裕太后被迫同意清帝退位，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

至此，清朝统治中原268年<sup>[2]</sup>的历史宣告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

---

[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58页。

[2] 清朝的统治年限有三种算法：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为296年，从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算起是276年，从1644年顺治入主中原算起为268年。本书从通史计算办法，即第三种算法。

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终结。此时此刻，距武昌起义爆发，不过短短的126天。

这短短的120多天，却发生了让人眼花缭乱的风云变化：袁世凯出山、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而极端政治动态的变化中，又间杂着各地的社会动乱、财政上难解的困局、皇室的离心离德等，终于让不堪重负的清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切的开始，都是武昌起义时打向陶启胜的那一枪。

## 一 武昌起义：猝发与必然

尽管八月十九日夜武昌城的枪炮声意味着“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sup>〔1〕</sup>但起义的背景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即武昌起义本身的猝发性和当时孙中山革命运动的低潮期。

毋庸置疑，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早有起义的计划，但历史资料表明，武昌起义其实是一次猝发的事件。

为什么这样说？

原因之一是起义曾一再改期，最终爆发起义的八月十九日并非原定时间：武昌起义前的一个月，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与文学社的代表刚刚同意取消两个团体的名义，合作革命。八月初三日，两团体确定中秋节起义，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军政府总理。但因起义的时间被侦知，湖广总督瑞澂加强了戒备，总指挥部于是被迫将起义日期由原定的八月十五日改为八月二十日。

八月十八日，孙武等人在俄租界宝善里装配炸弹，为起义做准备，不慎发生爆炸。赶来的俄国巡捕发现了炸药、名册、旗帜、文告等，抓走刘公之妻及弟弟刘同等人，并引渡给清方。审讯后，清方得知起义秘密，瑞澂立即下令闭城调兵，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紧

〔1〕《辛亥首义史》，第7页。

急，当日下午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情急之下，指挥部成员刘复基一度拔枪，“说服”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发布命令，以夜半南湖炮队的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动作。尽管当晚十点时，武昌城内各营已通知完毕，但一连串意外让当晚举事又一次成为不可能——运送弹药的杨洪胜在工程营被军警执获；临近发动时，军警突然包围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总指挥部，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蒋翊武因蓄有长辫、着白布长衫且满脸村气，未被注意而乘间逃脱）；负责传达命令的邓玉麟费尽周折出城到南湖、翻营墙进入炮八标营房时，已是半夜时分，士兵沉梦正酣。这样，蒋翊武临时决定的八月十八日起义计划也未能如期进行。八月十九日黎明，清廷处决了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并捕获了三十多位革命党人。

至此，湖北革命党起义的日期已由原来的八月十五日两次被迫改成八月二十日、八月十八日，且均未成功。不仅如此，起义领导机构还被破获，可谓挫折重重。但幸运的是，散处于各标营的革命党人自动计议，于八月十九日夜成功发动了起义。这点，可谓出乎各界之意料。

说武昌起义是一次猝发事件的另一原因是：当时，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就连湖北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如蒋翊武），事变是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的，带有很大程度的“猝发”性质。<sup>[1]</sup>正在美国各地筹款的孙中山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报纸上欣然得悉武昌起义<sup>[2]</sup>的消息的——事后他自己也承认，“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sup>[3]</sup>另一革命领袖黄兴则是在香港通过宋教仁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起义消息的。

由于一时找不到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人，起义之后，湖北军政

[1]《辛亥首义史》，第8页。

[2]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76年，第104页。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43页。

府不得不推举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鄂军都督。据记载，起义爆发后，黎元洪避匿于部属家中，后被挟持至湖北省咨议局，强令为都督。黎元洪害怕事后被清廷追究，一力推辞，以致被软禁于咨议局。此后几天，黎一直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盘膝闭目，成了“泥菩萨”。直到得知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才骤然改变态度，于八月二十一日同意剪掉自己的辫子。至于此前湖北军政府发布号令所署的黎元洪之名，均为他人代签<sup>[1]</sup>——一场以推翻清廷为目标的起义，竟然推举一位与革命素无渊源的清朝军官为领导，这也证明了武昌起义之仓促。

腐朽没落，倒行逆施，激化国内重重矛盾，天怒人怨，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这是总结朝代更迭的习惯性思维。宣统时在内阁任职的许宝蘅就将清的亡覆归结为天意，他在日记中说：“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sup>[2]</sup>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激起民变不断，最终民众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观点，至今依然是历史教科书的主流。<sup>[3]</sup>

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加剧确实导致各地民变不断，但客观而言，宣统三年的民变状况并非最严重的。

海外学者杨庆堃根据清代历朝实录，曾对道光十六年（1836）后每十年清代民变数量进行过统计：

1836年后每十年清代民变数量<sup>[4]</sup>

年份	民变数量（次）	年份	民变数量（次）
1836~1845	246	1876~1885	385
1846~1855	933	1886~1895	314

[1]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2013年，第311页。

[2]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394页。

[3] 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历史》第2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4]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78页。

续表

年份	民变数量(次)	年份	民变数量(次)
1856~1865	2332	1896~1911	653
1866~1875	909		

而据张振鹤、丁原英等根据《清实录》及当时报刊、专著、地方志等所辑的《清末民变年表》，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这十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为 1131 次<sup>〔1〕</sup>，二十二省无处不有。

由于各地官员的瞒报，可以肯定，实际发生的民变数量会更高；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两个统计数字并不一致，但还是可以得出鸦片战争后民变频繁的基本结论。与此同时，由上表可知，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五年，653 次民变的数目仅为“中上水平”，遑论远逊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捻军时的 2332 次，也不及表中 933、909 这两个数字。具体到宣统三年，《清末民变年表》的数据只统计到八月，共有 107 起。这个数据，虽比光绪二十八年的 74 起多，但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 107 起、宣统元年（1909）的 143 起相比，并没有显得十分突出。

孙中山等领导的同盟会，此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海外。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发起对清廷的最初一击开始，十多年来，孙中山以极大的勇气，克服艰难险阻，曾领导和指导发动了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由于在经费使用上存在分歧，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三十四年间，同盟会内部还发生了两次倒孙风潮，面临分裂之虞。为了振作士气，汪精卫在宣统二年不惜铤而走险谋刺摄政王载沣。加上清廷正仿行立宪，可以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清朝的威胁正处于低谷。

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甚至持更为乐观的看法：

〔1〕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总 49、50 号。

“到1908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镇压了下去。”<sup>[1]</sup>偶发的武昌起义却促使清王朝垮台的史实，同样令他们颇为不解：“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sup>[2]</sup>

如果套用外忧内患导致王朝灭亡的观点，那清朝灭亡的时间应该是内乱最炽的太平天国时期，或者是外患最重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外忧内患”既然不是清王朝灭亡最直接的原因，那么一个偶发的事件、一场仓促的起义，为何到最后却压垮了清朝这个当时经济总量全球第二<sup>[3]</sup>、统治中原已达268年的政权？这需要我们目光投向清王朝灭亡前的十年甚至更早的时间……

## 二 十年立宪之失败

对于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之后面临的—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其中的路径，则经历了由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的探索。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实行君主立宪的“小国”日本先后战胜了中、俄这两个实行封建帝制的大国。残酷的现实，让国人真切感受到宪政体制的优越性，激起了上至督抚下至庶民呼吁实行立宪的热潮。截至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月底），在位的八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五位

[1]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2—583页。

[2]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3页。

[3] 正如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说的，由于“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要想计算出晚清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分困难的。据该书估算，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3.4亿两[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9页]。纪录片《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

奏请立宪，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奕劻也明确表示支持立宪变法。江浙立宪派人士张元济等则开始了“奔走运动”，并首次提出遣使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的主张。如此，使得立宪已成不可避免之趋势。连日会议讨论之后，慈禧于六月十四日发布谕旨，遣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sup>[1]</sup>。晚清立宪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在得到考察大臣载泽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sup>[2]</sup>的承诺，并经过自己一番痛苦权衡后，慈禧终于下定立宪决心。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俗称《仿行立宪上谕》），公开承认中国的专制制度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预备立宪进入正式启动阶段。

一个有限的君权、一个责任的内阁、一个民选的议会，此三者是君主立宪的题中之义。《仿行立宪上谕》虽已颁布，但何时立宪、如何立宪，清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此，自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至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夕，以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全国有据可查的参与签名者达十五万人之多。<sup>[3]</sup>

在民众压力之下，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甚至包括军机大臣等纷纷奏请速开国会。军机大臣奕劻亲自向慈禧和光绪奏陈：“若不及早将国是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sup>[4]</sup>一番动情陈述让

---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29页。

[3] 周叶中、江国华主编：《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4] 《时报》，1908年9月6日。